

中 國 佛 神 譜

余大喜著
中國佛神譜
正編
西漢
諸君
切勿
亂傳
廣
民族出版社



余大喜 编著

《中国傩神谱》

中 国 傩 神 谱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傩神谱 / 余大喜编著 .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11

ISBN 7-5363-3833-3

I . 中 ... II . 余 ... III . 傩神 - 研究 - 中国 - 图谱
IV.B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1215 号

ZHONGGUO NUOSHEN PU
中 国 傩 神 谱

余大喜 编著

选题策划 覃琼送
文字编辑 覃琼送
美术编辑 张文馨
装帧设计 张文馨
责任校对 黄春燕
责任印制 蓝剑风
出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制版 深圳彩帝毕升实业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24
印张 8.5
字数 210 千
图片 145 幅
版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ISBN 7-5363-3833-3/J · 504 定价：148.00 元







序——薛若琳

余大喜同志长期从事巫傩文化的研究，他经多年的田野考察、搜集抢救和潜心研讨，写出一部《中国傩神谱》，即将出版，嘱余为序，我欣然承命。

傩神有着一个庞大的神仙谱系，有全国级的傩神，例如元始天尊、元始天王、玉皇大帝、三清（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西王母、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北极紫微大帝、北斗真君、文昌帝君、彭祖等；也有地方级的各路傩神，例如茅山、梅山、水神、开山猛将、先锋小姐、八郎、殷元帅、赵元帅、王元帅、马元帅、周将军、曹将军、唐将军、功曹等。傩神队伍的庞杂，说明各地区、各民族傩祭仪式的繁杂。但是，他们都是神的系统。

神话和神祇，是有密切关系的，神话越多，神祇也就越多。然而，我国神话较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一、中华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自然条件艰苦，生活辛勤，重实际少幻想，不能把传说故事集中起来流传。二、孔子问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为教”，对于上古神怪传说，孔子和他的学生都绝口不谈。后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使神话传说不但不能发扬光大，反而又有散亡。三、远古时代神鬼不分，人鬼也可以转为神祇；人神混杂，影响了神话的产生。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他们生存于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需要时时与天然奋斗，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的意见差不多，都认为黄河流域生活艰苦，古代先民比较朴实而缺少想像力。茅盾先生在《茅盾评论文集》中提出了与鲁迅、胡适不同的看法，尤其针对胡适先生的观点认为，只就“三百篇”以论定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没有神话，证据未免薄弱了些，因为“三百篇”是孔子删定的，孔子不言怪力乱神。茅盾先生说，要论“时时要与天然奋斗”，北欧、南欧的地理位置比中国还北，但是，北欧和南欧的希腊却有很多神话。茅盾先生也不同意鲁迅认为孔子“实用为教”对神话的冲击，他说，孔子学说在战国时亦未有绝对的权威，这并不是北方神话少的致命伤。茅盾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缺少神话，一是神话的历史化，神话的历史化太早，很容易使神话僵化。中国北方的神话，大概在商周之交已经历史化很完备，神话的色彩大半

褪落。二是当时社会上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诱发“神代诗人”的产生。穆王西征，一定是当时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所以后来就有了“神话”的《穆天子传》。周武王伐纣至周平王，中国北方人民过的是“散文”的生活，不是“史诗”的生活，民间流传的原始时代的神话得不到新刺激来发扬光大，结果渐渐僵死。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生活已经是写实主义的，离神话时代太远了。诸子争鸣，皆不言神话。袁珂先生的意见与茅盾先生的意见基本一致，他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说，儒家要么不讲神话，要么将神话历史化，把神话加以人化，把神话传说加以理性的诠释，于是神话就变成了历史。袁先生的话讲得很深刻，这使我想起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赞》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因为“难言之”，传说中的“黄帝四面”，即黄帝有四张脸，大约“其文不雅驯”，于是孔子解释为“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称四面”（《太平御览》卷79引《尸子》）。又如“黄帝三百年”，是说黄帝活了三百岁。孔子却解释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数百年。”（《大戴礼·五帝德》）再如“夔”，在《山海经》里它本来是一只怪兽，鲁哀公问孔子为什么“夔一足”？孔子解释：所谓“夔一足”，并不是说夔只有一只脚，而是像夔这种人有一个就够了。到了《书·尧典》中，夔竟成了舜的乐官（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儒家对神话的历史化，恐怕主要集中在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时儒家学说居于思想领域的正统地位，儒家对大批神话进行历史化的操作才有可能。那么，在儒家学说被正式立为权威性思想之前，又是什么原因使神话不能流传呢？我认为古巫是神话的创制者和保存者，古巫的活动和遭遇，对神话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是原始宗教的产物，也是原始先民崇敬的人物。巫具有多方面的才干。早期的巫既长于歌舞，又能施展法术，同时也是部落的首领，三位一体，巫的内涵显得很丰富，形象显得很完美，在原始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传说巫是太阳神的使者，我们的祖先都崇拜太阳，三皇五帝，无一不与日、光、赤、炎有关。在甲骨文里，“巫”写作“巫”，因为巫是太阳神的使者，需围绕太阳旋转，所以从象形上看，“巫”是旋转的象征。巫在祭祀时所穿的裙子，夏、商及西周、东周时是红色的，并且这种裙子全用无数飘带组成，旋转时纷纷飘起，形成一个红色的圆圈，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因此，巫总是与舞联系在一起的，《说文》释“巫”：“以舞降神者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夏商两周时期巫祀鬼神的歌词，惜全部失传，巫舞现在还有遗风。“巫”的另一种诠释

是，上横下横表示天地，左竖右竖表示四方，象征巫能沟通天地四方。

巫的势力和影响，也随着政治斗争而变化。颛顼相传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后裔，被黄帝族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代仍崇拜巫教，杂拜鬼神。颛顼下令禁绝巫教，强迫九黎族遵行黄帝族的教化。殷商时期巫史之间的斗争有时很尖锐，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或干预政治和国君行动。巫官的职责偏重鬼神，史官的职责偏重人事；巫官能歌善舞兼医治疾病，代鬼神传达旨意主要靠卜法；史官能记人事，观天象和熟悉典故，代鬼神传达旨意主要靠筮法。巫官和史官都争当代表鬼神发言的权威，商汤站在史官一边，下令禁止巫风。可见从原始氏族社会的颛顼时代到阶级社会的商汤时代，巫并不老是得意的。但总的来讲，殷人信鬼观念很重，所以巫风在南方还是很盛行的。到了西周和东周时期，国君开始重史不重巫，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周公制礼，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煞。”这对巫事活动打击很大，由于“礼秩百神”，并且“定其祀典”，巫傩神坛的范围也受到了限制，而且“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巫歌巫舞受到很大的削弱，因此，神话的保存便受到极大的削减。

儒家对神话进行历史化，巫傩后来变得很聪明，他们也将历史进行神话化。例如历史人物姜太公、华佗、诸葛亮、关羽、武则天、张巡、许远、柳宗元、包公等，都进入了巫傩神坛。张巡、许远是唐安史之乱时河南睢阳的守将，叛军兵临城下，屡屡劝降，二将拒之，终因援兵不到，城陷死之。老百姓敬仰张巡、许远是一方的守护神。柳宗元是唐代的大文学家，他因为参与革新政治，在党争中被贬到柳州，他为柳州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人民尊敬他、思念他，把他视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升为傩神。包公主持正义，铁面无私，被人民称颂，也加入傩神系列。而且他们都有一篇神的故事，这可以说是补充的神话。但是，在众多的傩神谱系中，由历史人物转为傩神的，毕竟是少数，大量的还是传统的、民间的傩神，这些傩神来历纷纭，职能各异，面目繁杂，在驱鬼逐疫、祈吉纳祥中，发挥着他们巨大的作用，每一位傩神都有他们形成的历史和故事，表现了民间对他们的评价、敬慕和追思。

大喜同志将众多的傩神汇集在一起，用新的视角，按谱系叙述他们的缘起、功能、作用，以及他们的各自特点，这对巫傩文化的研究，将起到推动作用。谨为序。

1999年8月5日

(注：作者薛若琳，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傩戏学研究会顾问)

目 录

绪 论 1

主 神

莫一大王	14
雷王	16
姜子牙	18
伏羲	20
八部大王	21
彭公爵主	22
药王	23
李老君	24
川主	26
土主	28
芒高	30
盘古大王	32
梅山大王	34
盈瓠大王	36
功曹	38
唐、葛周	40
东山圣公、南山圣母	42
八十	44
东岳大帝	46
南岳	48
欧阳金甲大将军	50
阿布摩	52

凶 神

泰山石敢当	56
黑垮大将军	58
炳灵侯王	59
孽龙	60
统兵元帅郭三郎	61
五伤神	62
武财神公虎	63
包龙须元君	64
温郎	66
下洞娘娘	67
王灵官	68
五路神	70
九首二王	72
孤猖卒任	74
王魂	76
九十五鬼	78
杨杨	80
开路将军	82
判官	84
殷钟	85
开山猛将	86
雷公	88
白虎星	90
	92
	94



善 神

冯三界	98
白马三姑	100
三楼六国婆王	102
武婆婆父	104
阴阳师公	105
李令	106
梁麟	108
广福	109
特甘花	110
朱瑞柳	112
地丫	114
灶	116
秦苗娘	117
梓鲁	118
甘白	119
七柳	120
六探	122
白褚	124
春	125
雄	126
四官	128
大王	129
君	130
君	132
娘	134
哥惠	135
郎	136
文郎	137
牛郎	138
圣侯	139
马郎	140
路郎	141
旗太	142
太	143
雄	144

动物神

龙	神	176
虎	神	178
熊	神	179
牛	神	180
猪	神	182
头	神	184
鸡	神	186
蛇	神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191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傩神，虽然没有佛教诸神、道家神仙那么显赫，但若要论其历史，往往要追及太古。

“傩”是“魖”的假借字，《说文通训定声》释魖云：“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魖。为经传皆以傩为之。”训诂学知识告诉我们，傩是古代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中国古代有三大祭祀，“蜡祭”酬谢神农氏，“雩祭”是干旱之年的求雨仪式，“傩祭”用于驱赶威胁人类生命的疫鬼。人们戴着狰狞的假面，把自己打扮成具体的神灵，飞舞手中的兵器，口中发出“傩、傩”之声，以驱赶想像中的疫疠之鬼。我国最早见著于文字记载的傩神活动是《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殷度。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殷方良。”意思是说，“方相氏”蒙熊皮，戴黄金四目假面，手执兵器带领百隶在宫廷内搜索驱疫，并为大丧出殡开路，在墓穴内驱逐鬼魅。毫无疑问，“方相氏”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傩神。

然而，“方相氏”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傩神，他只不过是夏官编制中的一个武事官职，或是负责驱鬼逐疫的巫师。他只有带上黄金四目的假面，才能成为真正的傩神。因此，假面也就成为傩神的基本特征。甲骨文中有一个象形字(囂)，像是一个人戴着面具，据郭沫若先生考证为“魖”字。《辞海》释“魖”云：“《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郑玄注：‘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魖头也。’”“魖头”即假面，假面信仰是神灵崇拜在古代先民思维意识中的一种反映。古代先民认为疫疠之鬼是十分恐怖可怕的，要“惊驱疫疠之鬼”必须比疫疠之鬼更加凶猛可怕。于是，古代先民依据自己的想像，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的偶像，通过假面模拟具象成一个个具体的傩神。古代神话中的蚩尤氏“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述异记》），是一位凶猛神勇的战神，虽然被黄帝擒杀，但黄帝仍借其威而“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龙鱼河图》）。借助蚩尤的威力来恐吓、攻击和驱赶疫疠之鬼，在当时是很恰当的，因为蚩尤面目狰厉，神勇无比，足以让疫鬼闻风丧胆，因此蚩尤氏很可能就是方相氏装扮的原型⁽¹⁾。

有神必有祭祀。傩祭是中国古代三大祭祀中影响最大、最为隆重的祭祀活动。周代的傩祭已纳入“礼”的范畴，成为国家重要祭祀典礼，有天子与诸侯专用的“天子傩”，有全国上下举行的“国傩”，还有民间庶人举行的“大傩”，也称“乡傩”。这说明傩祭在古代无论是

宫廷还是民间都相当普遍，而且等级分明。

中国封建宗法根深蒂固，等级森严。什么人，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傩神都有等级规定，“季春之月命国傩，仲秋之月天子乃傩，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礼记·月令》）。任何人不可僭越，不可乱章。用不用方相氏也是十分讲究，“三品以上及五等开国，通用方相，四品以下，达于庶人，以魋头”（《隋书》）。宫廷用方相，规格很高，需佩戴青铜制的假面。但是，用魋头与用方相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尊化，一个卑化。民间用魋头是宫廷用方相氏的对应形式，其“方相意识”一直贯穿其中，延续至今。现今民间傩神家族中，大都保留了“开山”、“开路”之类的傩神，它们都是古代方相的卑化残存。《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称：“开路神君，乃是《周礼》之方相是也。”

行傩如此，观傩也是十分强调等级官序的。《隋书·礼仪志三》载：“皇帝常服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以下，从六品以上陪列预观。”当时按官位品级排列观傩是礼的要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克己复礼”，但孔子见“乡人傩”，却“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孔子是鲁国的大夫，他是按大夫的身份遵行礼典规矩，身着朝服冠冕肃立于家庙门前的东阶恭迎傩神。可见在当时官傩与乡傩并行于世，同为隆重祭祀仪典。

两汉时期，傩祭基本沿袭周制。但傩神结构却有所变化，方相氏麾下的“百隶”，改换为宦官子弟的“振子”，还增加了专门食鬼的“十二神兽”，并有充满恫吓的“神咒歌”。这些变化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详细记载：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振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卫陛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振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振子和，曰：“甲作食殃，肺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魃，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

从汉宫庞大的傩神阵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行傩的神鬼系统已是泾渭分明。代表傩神的一方有甲作、肺胃、雄伯、腾简、攢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代表鬼怪方面的有殃、虎、魅、咎、不祥、梦、磔死、寄生、观、巨、蛊等。

这些冷僻、怪诞的名字，今人看来都很陌生。但仔细考究起来，个个都能说出它的原型。甲作是猿猴，肺胃是狒狒，雄伯是虎，腾简是猩猩或人熊，攢诸是蟾蜍，伯奇是鶡鸟，强梁是虎，祖明是朱雀，委随是蛇，错断是虎形兽，穷奇是怪犬，腾根是腾蛇^[2]。然而，被驱逐的鬼怪集团却不一定是指称某一厉鬼，它们是意念当中的鬼，无形的鬼，就像今天民间驱傩，神是具体的，鬼却是无形的。如：凶泛指凶邪之事，魅为疫鬼的通称，虎指食人凶鬼，不祥统称不吉利的事物，梦指种种恶兆。

从这些被驱逐的疫鬼集团中，我们可以看出傩的功能已经从“大丧先柩”、“及墓入圹”扩展到驱赶人间所有鬼魅魍魎和一切不祥。

值得提出的是“虎”这个神怪，它既是十二神兽，又是被追食的恶凶。这倒也不奇怪，我国古代民俗神话中常有神怪易位的现象。在人们心目中虎是百兽之王，凶猛无比。人们将它视为神兽，借其凶猛逐恶避邪。虎也确实是山林中伤害生灵的凶物。《山海经》中有许多由虎变化而来的怪兽，如其状如虎而牛尾的“彘”，如人而虎身的“马腹”，如人而虎尾的“秦逢”等。这种正负价值的对立转换在民俗学中称为“对转律”。

原先，中国傩神信仰中的鬼神系统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中，宫廷傩仪一直严格恪守“方相模式”，只是阵容一代超过一代。唐代宫廷行傩“用方相四人，振子五百”（《乐府杂录》）。其规模、声势远远超过前朝。但是民间傩仪却不一定那么严格。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有一段记载：“十二月八日，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胡头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头饰，金刚和力士是佛教中的护法神，用金刚力士取代方相氏可能与民间崇尚佛教有关。而在敦煌地区，民间则以钟馗取代方相氏，斯2055《除夕钟馗驱傩文》写道：“咸称我是钟馗，捉取浮游浪鬼。”这又可能与唐明皇梦钟馗啖鬼有关。这些变化说明民间傩神正在冲破宫廷傩仪沉闷而又封闭的樊篱，傩神结构也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神圣走向世俗。在中原地区，民间驱傩也出现了傩公、傩婆之类的傩神，唐人李卓在《秦中岁时记》中写道：“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有二老儿，其

名皆作傩公、傩母。”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傩公、傩母是以装扮的形式出现的，它与《乐府杂录》把驱傩仪式纳入乐部一样，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民间驱傩的宗教色彩有所减弱，娱乐色彩有所增强。这就为后世民间傩神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性质打下了基础。

傩神结构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神圣走向世俗，宋代是个转折点，这与两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有密切关系。赵宋之世，宫廷傩仪一扫前朝森严恐怖气氛。方相氏、十二神兽、振子等全被皇城亲事官、教坊伶人取而代之，出现了将军、门神、判官、钟馗之类俗神。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

这段文字表明，宋代傩神系统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傩神大换班，大量的道教神祇拥进傩坛，显然与宋代崇奉道教有关。宋代是道教王国，宋徽宗笃信道教，自号“道君”，滥封鬼神，道宫遍布全国各地，三清、天帝、三官、三元、四圣、五岳、门神、将军、六丁六甲、土地、城隍，道教神祇多如牛毛，统治者的提倡赐封，使道教势力更加膨胀，也势必影响傩坛。因此，孟元老记述的禁中大傩有傩神千余名，恐怕是确有此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也有类似的记述：“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说明宋代傩神系统已日趋庞大，并呈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格局。

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禁中的大傩多由教坊伶人装扮傩神，娱人成分明显增加，已出现了故事情节的雏形，如“钟馗小妹”、“判官”的出现，似在演释《钟馗嫁妹》和《五鬼闹判》的故事。

两宋时期，各种人文艺术形式蓬勃兴起，歌舞、杂剧、百戏、南戏粉墨登场。宋代戏曲的兴起，大量的“路岐人”介入傩事活动，对当时乃至后世的驱傩活动影响深远。在宋代，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驱傩，“扮神逐鬼”已成为驱傩活动的显著特征，南宋诗人刘镗，高年

隐居乡间僻野，对当时的民间“乡人傩”曾作过一首七言古诗——《观傩》，诗中对当时的“扮神逐鬼”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扮神者“自夸搜捕无遗藏”，扮鬼者“五方点队乱纷纭”，其扮演的傩神有：蓬头铁骨的夜叉，拿芭蕉扇的红裳姹女，握蒲剑的绿绶髯翁，独居堂中的阎罗，戴马面的判官，饰牛头的判官，舞蒺藜的小鬼，破绔简靴的终南进士等^[3]。显然已带有明显的戏剧艺术的色彩。

其实，傩神在滥觞之初就蕴藏了宗教艺术的基因。早期的假面模拟，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肖神”活动，一种仪式性的“肖神”表演。鬼神是无形的，要把无形的鬼神显形为直观的具体鬼神，傩选择了假面模拟。当巫觋带上假面，装扮成傩神，做一些鬼蜮黠形的动作，使虚幻中的鬼神世界，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信仰者面前，傩神的神威也就更加具体了。进入父系农耕社会后，原始信仰中的自然神人格化了，新的民族英雄和祖先神祇不断涌现。人格化的欲望，赋予了傩神许许多多情节曲折的神话故事，它们的神迹和故事，主要是通过仪式化的表演来征服和教化信仰者。明清以来，傩仪在宫廷逐渐衰微，大量的傩神流入民间，成为“旁门左道”。而民间社火日盛，神诞聚戏蔚然成风，傩俗在民间与社火相融会，并迅速向民间歌舞、戏剧等艺术形式渗透。所谓娱神是为了媚神，讨好、笼络神灵，取得神灵的庇护，娱人是为了生存发展，招徕更多的信徒。

借助民俗和艺术的形式，是傩神赖以生存和流传至今的重要手段。傩神能在民间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民俗和艺术的力量。傩为了招徕更多的善男信女，对一些当地流行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傩化”处理，使肃穆凝滞、单调乏味的法事更具有观赏性，更能吸引善男信女。如贵州地区的傩坛法事：先请土地神上场打扫坛场，接着掌坛师发文，将请愿之事报告三界神灵，功曹接过文牒，回禀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派出各路神灵。一上场表演自己的驱邪神威。如“开山将军”手执大刀，边舞边唱：“天瘟砍出天堂去，地瘟砍出十方门，左边砍出招财路，右边砍出进财门……”各路神灵表演完毕，最后请出包公为愿主勾愿。这种将傩坛法事以故事化、角色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形式，使原来静态的偶像(面具)变成了赋以人性的、并能够和信仰者直接对话的动态形象。这种活生生的“对话”，对急功近利的信仰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慰藉，使傩坛法事更具有了“现身说法”的效应。民间把这种“傩化”的艺术形式称为傩戏、傩舞。虽然娱乐色彩比较浓重，但它并没有改变傩神的性质，信仰民众